

“文化自信”的出场背景、现实理据与制度实践

李武装*

【摘要】文化自信并不是“文化优越论”基础上的唯我独尊，而是“美美与共”理念浇铸的文化发展逻辑。在国际学界，文明（文化）视野的复兴构成此一研究兴起的国际大背景。我们今天重新勘定和彰显文化自信的理论内涵及其新伟力，就是在把发展优势转变为话语优势的道路上做出的新努力。文化自信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层面的文化自信因其最基础、最广泛和最深厚从而蕴含其他三个自信。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可以在经济、政治和狭义文化层面分别找到现实理据。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量“国企”所奠定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经济不可能完全受制于西方资本集团，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真正经济基础；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奠定我们文化自信的政治基础；而正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和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的中国文化自身，赋予我们文化自信的狭义文化基础。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自信之制度实践路径，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与落实为落脚点。后者完全可以从七个方面进行战略性制度设计。

【关键词】文化自信；文化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实践

一 文化自信的出场背景与研究现状

如果认为文化本身就是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并在此凝结过程中实现人类精神价值的传承与更新，那么，“文化自信”无疑是对一个国家、民族或团体之精神和灵魂主体性的认问、确断、再造和坚守，其实质就是“文化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身份的自主性创造。毋庸讳言，经历发展价值观的诸多变迁与自我矫正，经历“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造谣与攻击之后，“发展优势”

* 李武装，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哲学研究。

如何转变为“话语优势”就成为一个亟待厘定的理论问题。事实上，我们今天重新勘定和彰显文化自信的理论内涵及其新伟力，就是在把发展优势转变为话语优势的道路上做出的新的智识性努力。它一方面是要唤醒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意识，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基础上塑造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也是在终极意义上，它是对人本身之存在理据、生存态度、生活方式之自主性选择逻辑和实践困境的深彻反思与自觉。

必须承认，文化自信并不是“文化优越论”基础上的唯我独尊，而是“美美与共”理念浇铸的文化发展逻辑。它不仅认为我们的文化最适合我们，而且相信可以在此基础上学习其他先进文化从而致共同繁荣与辉煌。因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迷失的价值坐标中，“他者”的形象再造与“自我”的生存定位，同样需要合理性证明与合法化确认。特别是在习近平 2016 年的“七一”讲话后，学术界一致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内在生命力——“文化自信”，正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三大文化客体，渐次积淀出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烘托出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也相应置换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风骨与示范性资质。这种主体性风骨与示范性资质，试图突破文化与政治、西方与东方、抑或“古今中西”问题的既有羁绊与内在短绌，正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基本确认前提，以“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为最新话语表征范式，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渐次获得普遍青睐与全球共享，其研究也正风生水起。

在国际学界，文明（文化）视野的复兴构成此研究兴起的国际大背景。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通过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指出了新教伦理（经济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塑造从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刻影响，即新教伦理（艰苦奋斗和积极进取精神）的本质是立足此岸、面向彼岸的合理价值观，这种对来世灵魂归宿的关注，恰恰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终极价值，弥补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缺陷。可以说，这种宗教伦理和宗教群体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强大盟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崛起并取代传统主义提供了发生学上的原因。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借助资本主义内蕴的“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的双向演绎并最终互相敌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文化结构性病症。事实上，这两本书都是从“文化—价值”层面分析社会发展问题，为之后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奠定了思想资源和学理基础。而近年来以艾森斯塔特为代表的比较文明分析学者提出的用“轴心文明”（axiality）和“现代性”（modernity）的关系来应对“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多样文明问题，更是把此研究推向深入。不仅如此，文化与意识形态相勾连所彰显的“文化软实力”“文化新伟力”阐释与践行路向，更为“文化自信”的出场做好了国际舆论铺垫。这一方面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雅克斯·莫兰的“电波战”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但这些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基本为西方“文化霸权”发声。

面对国外强势文化来袭以及我国文化地位的广受关注,我国学术界也致力于“文化转向”从而“文化自信”的研究。就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而言,王缉思的《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王晓德的《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周琪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刘建飞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胡惠琳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金民卿的《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苏国勋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和李希光的《软力量与全球传播》等论著可谓代表,这些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分析了文化、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而且对冷战后西方的“文化霸权”及其新动向进行了分析与前瞻。就文化本身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言,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书,立足于全球化国际大背景,探寻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问题,颇具理论前瞻性。就文化与现代性关系来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围绕“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再到建构“中国模式”这样一条大的学术理路展开研究,先后出现了如下新思想、新命题和新方法,譬如杜维明的“文化中国”、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王岳川的“中国形象”、张法和张颐武的“中华性”、赵汀阳的“内化他者”、霍桂桓的“生成论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视角”、张汝伦的“提供一种独特的文明态度”、韩震的“新的包容性的多重认同重构”等。

单就纯粹的“文化自信”研究而言,据中国知网检索,以“文化自信”为关键词的核心期刊文章就有1159篇,内容涉及“文化三自”(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内在关系、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进一步诠释、文化自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文化自信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文化自信与文化强国战略的关系、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文化自信的理论嬗变和逻辑演进、文化自信的培育路径等,可以说,这些研究基本开启了文化自信的中国研究路径,并且,某些研究已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与前瞻性。譬如,首都师范大学杨生平教授认为,“中国文化要实现他人称道的文化自信,就必须要有清醒的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过程”^①;苏州大学任平教授认为,“中国文化自信的当代使命不仅在实践上推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而且要在理论上反思性地引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以文化自信、自觉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形态”^②;清华大学韩冬雪教授认为应以软实力概念来解读文化自信与传承,“把软实力理解为综合国力凝聚认同效能的表征,并严肃探讨其与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的关系,将有

① 杨生平 《文化自信的意义及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

② 任平 《全球文明秩序重建与中国文化自信的当代使命——兼论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形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1期。

助于我们更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主义与价值，而把软实力提升同构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探寻人自身价值的回归与升华相结合，无疑也是中国由自信、自立、自强到踏上为世界大同做出更大贡献之路的起始性工程”^①等，不一而足。问题在于，这些研究的系统性还不够，期待进一步加强。

综上，可以看出，自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文化一文明为分析视角的相关研究引领着学术走向，“文化转向”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风向标，但是，西方研究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属性，他们的研究要么为西方辩护，要么为西方重新宰制世界做理论宣传。我国学界在这一领域虽已有良好开端，但研究比较分散，专门研究“文化自信”的系统性专著几乎没有。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全面系统研究“文化自信”从而深入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炙手可热的理论热点，无论就政治大气候还是学术本身而言。

二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

立足于更广义层面，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即蕴藏在一个伟大民族复兴之现场拷问、理论攀升与实践建制之间，中国人民依托自己的历史回响、意识形态与文化诉求三者的良性博弈，基于中国立场和全球视野，对自己自主选择与创造的理论、道路和制度的认肯与持守。其实质则是五大理念发酵下中国人在精神层面对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模式等的一种源自内心的无比冷静、沉着应付和内在定力。问题是，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究竟缘何？自信何来？抑或说，是什么让当下的中国人如此自信而从容、优雅而坚毅地执着于自己既定的基本信念、价值目标和实践动力？又是什么让整个曾经任性的世界开始期待中国？从而也让正在崛起的中国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世界大国”的责任？下面我们不妨从经济、政治和狭义文化三个层面展开析论。需要插叙的是，如同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文化自信也有狭义与广义之理解。既然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在更广义层面上延展文化自信的生命力。换言之，广义的文化自信因其最基础、最广泛和最深厚从而蕴含其他三个自信。

（一）经济层面的文化自信

从经济学视角看，这种文化自信来自中国人对当下经济“新常态”的一种历史合理性把握与实践合规律性探索。一般认为，下行压力，支撑力和新动力，构成宏观分析经济潜力的三个务实面相。就下行压力而言，尽管驱动中国经济的动力由于老套的体制机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未彻底化解而减弱乃至丧失，但谁能否认“全面深化改革”和“一带一路”催生和激起的新一轮强劲东风之威力，所以，看

^① 韩冬雪 《以软实力概念来解读文化自信与传承》，《人民论坛》2013年第18期。

清下行压力的未来走势，正确的方法还是“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只要子弹还运行在合理区间，即使稳中有降，也不足为奇。就支撑力而言，且不论传统的三大经济布局内伤——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差异不平衡和城乡差别——潜在的盘活经济势能之可能性，以下事实毋庸置疑：中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伴随新的技术驱动从而奠定的经济支撑力；广袤西部追赶东部强劲势头造就的经济支撑力；以及13亿中国人消费结构升级换代引致的经济支撑力，足以消弭下行压力置换的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之隐忧。就新动力而言，姑且不论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是否依旧有效（譬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认为“三驾马车”说存在重大缺陷），单就时下热络的改革红利、创新红利和人口红利（包括放开二胎生育带来的诸多消费红利）以及与之联动的创业—创客—创享机制的推介与实施（也就是李克强总理强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催生的新经济动能）而言，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崩溃”，更何况“供给侧改革”（指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四大要素重新实现优化配置，结构调整，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的号角已经吹响。可见，在经济新常态下，即使面临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等事实性拖慢经济发展之无奈或客观境况，但只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则可以说中国经济总体发展依旧处于一个可持续的“光辉岁月”。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国企”所奠定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经济不可能完全受制于西方资本主义集团的资本。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真正经济学原理。

（二）政治层面的文化自信

从政治层面看，我们不妨立足中西比较视域展开中国特色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个层面的述论，以此贞定我们与之相匹配的、应有的、该有的自信与风范。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利益，从而区别于西方的“党”。后者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竞选并票决出自己的代表，如此，一个多元的社会就由“分”走向了“合”。问题在于，非西方国家一旦采用了西方政治模式，社会“分”了之后大都再也“合”不起来了。从乌克兰到泰国、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包括时下的美国，都如此这般地败走麦城。今天的美国由于共和党与民主党势不两立从而深陷“分裂”图囿，致使其体制改革步履维艰，一如弗兰西斯·福山的论断，“极化政治”与“否决政治”正宰制着美国，美国正在走向“政治衰败”。进一步的忧思使得我们不禁扪心自问，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搞市场经济，为什么唯有中国发展得最快？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也因此，我们得出如下论断：①两党制或多党制可能导致政府内耗严重、产生不了有效政府和真正负责任的“顶层设计”；②当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要让既得利益让渡权力，要让权力最终回归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有效政府而非有限政府的出现和运营，显得多么弥

足珍贵。落实这些论断，尤其对还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只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释放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权利（人民主权）——这些权利事实上体现并受制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不断建设和完善过程。这些中国特色的人民主权思想与实践，基本上也超越了西方抽象界定的民主和单向度释义的自由。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那是源于诸多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

与西方政治制度相比，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选贤任能的制度、社会整合的能力和战略规划的定力。就选贤任能制度而言，较之于西方的总统竞选制，作为中国政治文化最深层的心理结构——“选贤任能”制度，包孕并体现着中国古代的政治选拔传统、红色传统和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某些合理做法，造就并带来一种“选拔+选举”的制度。它超越了西方仅仅依赖选举制度的人才涌流机制，使得中国当下拥有了一大批集丰富阅历、优良质素、坚定信仰和高效执政力于一身的政治人物和执政团队。就社会整合而言，由于全球化的纵深推进从而诸多利益集团分化、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纷争攀升事象，中国政治制度的整合与协调能力相应获得充分发挥。譬如，中国成功整合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城市移民问题（农民工）；中国成功实现了入世后的新一轮产业调整与整合等。就战略规划来说，中国一贯奉行“谋定而后动”的规划路线图和“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并辅以“群众路线”设计程序和方法。譬如一系列“五年规划”的实施，就是中国特色的顶层设计，能一以贯之地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有效结合起来。

至于依法治国层面，我们完全可以直面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最新阐述，管窥蠡测其逻辑实相和终极命理。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俗来说，一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企业与一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政府——市场良性互动体制与机制，正伴随“法治中国”的诞生悄然莅临。这与前文的共产党领导、人民主权思想及其制度落实，共同重建起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也自当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政治基础与保障。

（三）狭义文化层面的文化自信

从狭义文化层面看，首先，文化制胜律令之所以在当今批判理论中得以逐步展开并越来越具有竞争性，那是因为文化（其核心是价值观，其本质是伦理）及其言说、感受方式被更多赋予了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神圣使命。事实上，较之于政治的“断裂”伤痕与经济的“非常态”阴霾，文化更具有与生俱来的稳定性与本根性，因而更具有资质去标明与阐释中国的“集体记忆”与未来梦想，亦更有可能成

为世界认同中国的最大乃至钻石名片，一如往日的丝路文化在当下焕发新活力一样。

其次，立足于纯粹学术层面，从“新教伦理”的自信出场到“文明的冲突”的豪迈宣言，从“软实力”的掷地有声到“21世纪资本论”的风暴来袭，文化学思愈来愈引领着学术潮流。不难发现，如此文化诉求及其置换方式，不仅使文化本身从厌腻了的政治——意识形态体制和老套的专业学科机制中凸显而出，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的思想空间在体制外和机制外的加速度拓展，文化内蕴的公共性精神与包容性品质便一览无余地解蔽在众人面前，因之也天经地义地成为弥合社会伤痕与救治发展陷阱的新的“希望工程”。

最后，中国崛起的现实与想象早已引起了世界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关注，中国之于世界的影响亦开始从纯粹经济领域向着更深、更广的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进军。“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近年来我们在诸多官方文件中先后读到的“先进文化”“文化立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强国”及其实施战略等概念和命题，其逻辑导向和价值所指，都是不断接近和澄明“文化自信”这一新国家理性高阶和新伦理本体境界。因为无论如何，中国文化都正成为在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后全球化时代”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文化自信”自当理直气壮地对正在吁求的世界新秩序做出自己的努力，自当理直气壮地对正在生成的世界新历史理性精神做出中国式承诺。而这一点恰恰构成“文化自信”获得合法性论证与正当性认同之最为关键之处，也构成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一个最强劲、最具说服力的着力点。

三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制度实践

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自信之制度实践路径，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本文认为，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制度实践，可以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元共生并“美美与共”之价值理念期许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中获得渐次推进。

所谓主流文化，是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引导着整个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所谓精英文化，一般来指社会的精英阶层，主要是知识分子创造和分享的文化，主要是解释和宣传主流文化，进行社会教化，也监督着主流文化，批判社会现实。所谓大众文化，也叫流行文化，是一种与工业革命的产生、城市的发展、传媒和技术手段等的提高息息相关的文化，属于文化产业化之后的产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消费文化。当今时代，文化格局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形成了文化领域的众声喧哗，但同时也使主流文化代表的意识形态受到冲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必须承认，主流文化、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是对当今社会发展在不同层面的文化反映，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与西方文化、中华文化一起构成共时态层面的当代文化格局。在历时态层面，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等则演绎着文化的另一个版图。那么，所有这些文化格局或版图如何和谐发展呢？那就是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基本方略和战略定力。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①其建设在制度层面而言，完全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战略性制度设计。

（一）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战略

任何时代和社会都需要一种能被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去协调指导人们的行为，推动社会稳步发展。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我们更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和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我们要通过各种改革，重塑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自信的知识形象、理论形象和创新形象，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亲和力、感召力和创造力以及同其他意识形态的竞争力，为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发挥指导作用。

（二）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战略

在“后全球化时代”，加强民族凝聚力建设对于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它能确立中华民族文化进步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调动一切资源；它能强化民族意识，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它能弘扬民族精神，推动民族思想文化的进步；它能抵御外来文化强权的侵扰，维护国家安全。为此，我们应重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建设，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增强民族凝聚力。

（三）国家文化立法与文化管理体系建设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完善我国文化法律制度与健全我国文化管理体系才能为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1页。

我国文化自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保证我国文化机构正常发挥功能，也才能有效抵制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干扰。

（四）加强网络信息管理与建设战略

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网络信息技术对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挑战，我国要积极行动，跟上信息革命的潮流，同时要寻求对策积极应对信息霸权。我们应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措施：大力加强网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建设；利用网络大力宣传我国优秀民族文化；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防范体系；加强网络信息技术的自主研发；加强网络信息技术的法律法规建设等。

（五）推进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当今世界，各文化大国对文化产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文化产业的强弱已成为影响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面对日益激烈的文化产业竞争，我国必须重视文化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制定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增强国家文化产业实力，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便更好地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主要有：调整国家文化产业结构；抢占文化产业发展的“高端”位置；实施“走出去”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化；塑造文化产业品牌；保护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应对文化产业大国的资源掠夺等。

（六）加强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设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加剧，国家的对外传播能力及国家形象塑造战略对文化自信的意义不言而喻。我国应特别注重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设战略。拥有较强的传播能力，不仅有助于使国际社会客观公正地了解我国，而且能有效抵制各种对我国不利的妖魔化宣传；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则直接影响到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声望，有助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七）推进国际文化新秩序建设战略

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自信的建设战略，不仅要思考各种国内战略应对措施，而且要建设有利的国际文化环境，即通过积极推进国际文化新秩序建设来叠加我们的文化自信。为此，我们应坚持国家文化主权，抵制文化霸权；积极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利用国际机制，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使这些文化客体成为构建“文化自信”和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坚实基础。

The Background , Reality Basis ,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Li Wuzhuang

Abstract: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is not self-importance upon othe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uperiority , but a kind of co-exit logic theory to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 , the revival of the cultural vision become a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he rise of this study. We redefined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demonstrate its power in order to transfer the cultural superiority into the advantage of speech. There are narrow sense and broad sense fo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e broad sense is the most basic , the most extensive and the deepest to contain other kind of self-confidence.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s its practical theories of economy , polity and narrow culture. A large number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established on th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 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China economy to be completely subject to the western group capital , which results in the real economic principle of ou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our cultural confidence results from a series of political syste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culture is becoming respected and accepted internationally , which brings us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sense of narrow culture. All of thes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The latter can be completely designed from seven aspects.

Keywords: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translation;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ystem practice